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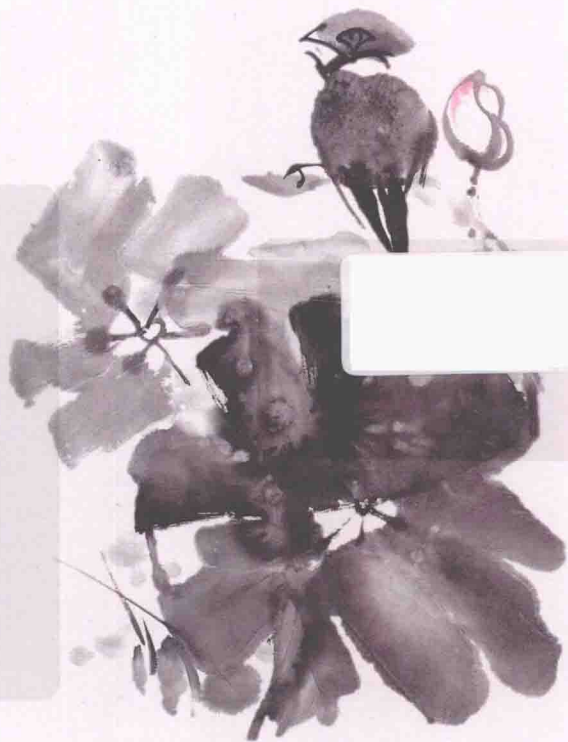


# 中国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即书房中常用的四种器具——笔、墨、纸、砚的统称。  
古时，我们的先人在创造灿烂的书画艺术的同时，也创造了这四种精良的文化用品。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孙敦秀 著



漓江出版社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孙敦秀 著

# 中国文房四宝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房四宝 / 孙敦秀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6  
(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  
ISBN 978-7-5407-6840-9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文化用品—介绍—中国—古代 IV. ①K8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269518号

ZHONGGUO WENFANGSIBAO

中国文房四宝

孙敦秀 著

责任编辑: 胡子博  
装帧设计: 李星星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地村村北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1109)  
开本: 650mm × 960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56千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80557366)

## 出版说明

文化是人类的本质，唯有文化的兴旺发达，才有国家民族的振兴强大。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辉煌璀璨，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弘扬传统，播传新知，砥砺精神，建设文化强国，我们谨从“秉文化情怀，做文化事业”的社训，特地编辑出版这套中华文化研究小丛书，以传扬民族文化精华，发布专门研究成果，期为读者、研究者阅读参考。作者均为国内外文、史、哲领域建树颇丰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擅长的专题，提供简明扼要的讲析，文字不在其多，书不在其厚，重在见解之通达准确，独有会心，能予读者真知与启迪，领悟精要，涵泳其间。本丛书是一开放性的项目，我们真诚欢迎在这一主题下有更多的佳作加入其中。

漓江出版社编辑部

2014年2月25日

# 目 录

1	序 言
5	第一章 笔
6	一、毛笔的传说与考证
9	二、毛笔最早的记录与实物
12	三、两汉制笔业的初起
17	四、魏晋南北朝制笔业的进展
22	五、唐代制笔业的繁荣
28	六、宋代制笔的改革
32	七、元代湖笔的崛起
36	八、明代制笔技艺的外传
40	九、清代制笔的特点
45	十、解放前后制笔生产的对比
54	第二章 墨
54	一、墨的传说及始用
56	二、周代的天然墨和人造墨
59	三、秦汉人造墨的实物发现
63	四、魏晋南北朝松烟墨的生产
67	五、唐代制墨业的盛况
74	六、宋代徽墨声名大震
81	七、元代制墨业状况

- 84 八、明代制墨业的兴盛
- 89 九、清代制墨业的起落
- 96 十、解放后制墨业的迅速发展
- 
- 100 第三章 纸
- 101 一、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
- 106 二、两汉纤维纸的问世
- 114 三、魏晋南北朝时造纸术的外传
- 122 四、隋唐佳纸产地的涌现
- 134 五、五代两宋的造纸艺术
- 145 六、元明造纸业的起伏
- 154 七、清至民国造纸业的兴衰
- 163 八、解放后造纸业的巨变
- 
- 169 第四章 砚
- 169 一、古砚的传说
- 172 二、商周砚的加工技艺和秦砚的出土
- 173 三、两汉砚的变迁
- 178 四、魏晋南北朝时砚型的逐渐完美
- 180 五、唐代四大名砚的出现
- 187 六、宋代制砚的扩展
- 195 七、元明制砚业的概况
- 202 八、清代制砚业的萧条
- 209 九、解放后制砚业的新天地
- 
- 217 后记

## 序 言

文房四宝即书房中常用的四种器具——笔、墨、纸、砚的统称。这种美誉，由来已久。古时，我们的先人在创造灿烂的书画艺术的同时，也创造了这四种精良的文化用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画艺术正是由此创造并不断发展而成为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瑰丽的奇葩，文房四宝同样伴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自身，日趋完备。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我国文明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两个瑰宝。

文房四宝，并不是始有文字就已具备齐全，发展也不是并驾齐驱，其问世各有先后，各有其自身的形成、演进、完善的过程。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加以研制、改进，使之成为品种多、用途广、技术精湛的一整套书写工具。它以独特的民族特色、时代风格和工艺规范，为历代临池者所艳称，名闻遐迩。

文房四宝，从广义上讲，泛指一切笔、墨、纸、砚；从狭义上说，因时而定，因物而论，因地而名。在纸未发明和广泛使用之前，多以竹、木简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年代，文房四宝就已初具形制，为世人所重。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实物来看：笔、墨、代纸材料的简及砚，已较完备、齐全，这就是我们

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四种文具实物。

西汉时，纸虽初露头角，仍未广泛应用，书写材料多沿袭秦时的竹、木简。四种文房器具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到了东汉，宫廷中专门设守宫令一人，主管御用笔、墨、纸张；当时的书家已较讲究文具的选用，汉隶代表书家蔡邕作书时最喜用张芝笔、韦诞墨、左伯纸。古籍中也多把三者并列记述，这里虽没有提及砚，可以想象，砚在东汉时也必定成为不可缺少的文具之一，特别是纸的运用和竹、木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纸的发明为文房四宝的完备增添了重要内容。

晋时，纸取代了竹、木简而成为主要书写材料，文房四宝的内容才名副其实。较为完备的笔、墨、纸、砚有力地促进了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和成熟。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叙述较为详尽的理论研究著作，从此便把笔、墨、纸、砚相提并论，并多见于当时书家著录的字里行间，传为晋女书法家卫夫人所作的《笔阵图》、晋书圣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均有对这四种器具各自特点作用的形象比喻和择优选佳的论述。更令人惊奇的是，1974年，南昌市区东湖一东晋墓中竟发现一件木方上记载笔、墨、纸、砚的文字，这使我们看到了我国最早的文房四宝皆备的墓葬文字记录，为研究文房四宝的发展、演变和应用，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我们可以这样说，晋时这四种器具的定型过程已基本完成。

唐时的笔、墨、纸、砚已有名优产品著称一时，饮誉海外。名品宣笔，较为完美；松烟墨制作已有较高的水平；宣纸已名噪一时；四大名砚（山东鲁砚、广东端砚、安徽歙砚、甘肃洮砚）驰誉四方。这些精致绝伦的文房器具，已受到当时书画家、文人墨客的广泛赞扬。武则天时的李峤就有咏纸、墨、砚、笔的诗传世，使文



房四宝登上诗坛，而广为流传。

南唐时，这四种器具在品种、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高，经过人们的实践和文人的倡导，文房四宝始有特定的内容，人们把澄心堂纸、李廷珪墨、诸葛氏笔、婺源龙尾砚，并称为南唐时的文房四宝。宋时的新安（今安徽徽州地区），则把产于该地区的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珪墨、羊斗岭旧坑砚，合称为新安四宝。

北宋时，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文房四宝的专著《文房四谱》，一名为《文房四宝谱》，苏易简撰写。“文房四宝”一词最早应出于此处。当时的书画家、文人都相当讲求精笔贵纸，妙墨佳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试笔》中说“笔墨纸砚，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足以证明文房四宝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宋时，地方官为取悦皇上，盛行以文房四宝上贡之风，徽州知州谢暨与理宗有椒房之亲，曾以新安四宝作为入贡的佳品。到了元代，文房器具的制作多沿袭旧法，改进不大，唯有湖笔声名大著。明时，这四种器具的制作技艺相当考究，逐渐朝着偏贵重、追求形式美的方向发展，使之具有高度的观赏和艺术价值。而在一些书家的著录中，则对这四种文具进行了座次排列，纸笔尤乃居先。明时“文房四宝”一词已流传开来，明李实曾有“四宝居一员”的咏砚诗句传世，以此管窥一斑。

明末清初，笔、墨、纸、砚的制作已达到较为完美的境地，浙江湖州府治的湖笔，安徽宣城府治的宣纸，安徽徽州府治的徽墨和广东肇庆府治的端砚，被誉为全国的文房四宝，至今盛名不衰。清时《纸墨笔砚谱》一书是较为集中叙述文房器具的专著。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掠夺和“三座大山”的压迫，笔、

墨、纸、砚的生产气息奄奄，一片凋零。许多知名产品工艺几乎失传，有的被破坏殆尽。新中国成立后，其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许多传统产品得以重新生产，并涌现了许多具有新时代气息、新的艺术风格的产品，不仅供国内创造书画艺术之用，而且还成为加强同国外友好睦邻关系的一条纽带。

今人对文房四宝的研究的著录，有穆孝天编著的《安徽文房四宝史》，区域性较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论述安徽所产笔、墨、纸、砚的历史演变的专著。1978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次“中国古代文具展览”，该馆工艺美术研究组根据这次展览的展品，按笔、墨、纸、砚四门列次，上自原始社会，下迄现代，以一百六十余幅的图版和少量的文字，编写了《笔墨纸砚图录》一书，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过去文房四宝的知识多散见于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的书画著录中，一鳞半爪，很难系统地论述它的发展全貌。今天，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广泛开展，本书对文房四宝这一宝贵的民族遗产，也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收集。为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记忆，本书按时叙事，以事带时，分门别类，对文房四宝的形成条件、主要产地、时代特征、制作材料、技艺方法和演变过程逐一讲述。阅后使读者对我国文房四宝的历史渊源、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向以及和其他诸多艺术的彼此关系有一系统完整的了解，这便是编著此书的主要目的。

## 第一章 笔

笔居文房四宝之首，多称为书具之主。这里的笔多指毛笔而言，其笔头是用动物的毛发加工而成，极富有弹性，易于提按顿挫，便于四方挥洒，能于八面出锋，书写而成的文字能给人以点划粗细曲直的线条美，疾徐涩迟的节奏韵律美，浓湿干淡的变化墨色美等多种美感。而且还有吸墨、吐墨灵便之特点。可见，毛笔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书写工具，而且更是艺术创作的造型工具。所以说，作为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两性工具——毛笔，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 一、毛笔的传说与考证

随着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增多与考证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我国毛笔的出现、发展,正逐步作出清楚而又合乎规律的解释。毛笔究竟起于何时,至今仍难以作出精确的回答。下面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有关材料暂作有益的探讨和叙述。

大约在一万年以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不仅石器增多,渐趋于美观,而且人类首次的发明物陶器已经出现,器彩各异。而这些陶器上,多绘有各种图画,刻有多样符号。这些图画符号,已开始用色彩进行描绘,这都是当时人们运用各种书写工具进行文化创造的有力证据。最富有艺术性的是中期的彩陶和晚期的黑陶。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渑池县发现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据测定在历史上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兴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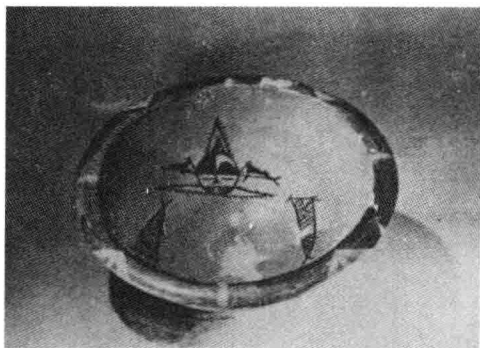


图1 人面鱼纹陶盆

时期。在出土的日用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图案或动物形花纹,古朴美雅,明显地看出是用毛笔或类似于毛笔一类的工具所绘制。在1952年发现的西安东郊半坡氏族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

陶,不少陶器是红色的。绘在彩陶上的图画,大都取材于原始人的劳动与生活,有人头像、游鱼、奔鹿、鸟纹、植物纹等生物的生动形象,而一般多画在盆、钵的里面(如图1)。纵观这些图画,其线条流畅,笔触清晰,并有明显的提按所造成的粗细笔画的痕迹。显然是用毛笔或类似于毛笔工具所绘制的,否则无法完成这美的杰作。属于这一类型的彩陶,在整个仰韶文化区域都有发现,所以也曾被称作彩陶文化。可见当时,类似毛笔的书画工具已被普遍应用。西安半坡遗址距今已有六七千年,可见我国使用软质材料制笔、用笔的历史之长。

到父系氏族社会,就有了较为成熟的原始文字,这些文字并呈现出刻画和书写的两种不同风格,较之母系氏族社会更加明显。1959年,在山东泰安地区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此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较为整齐。细看起来,有的陶器上文字笔画简朴硬朗,显然是硬质书写工具所致,有的陶器上文字的线条活泼流畅,定为柔软的书写工具所成。这两种风格的对比足以证明,当时人们除用单一的植物的杆、茎或其他硬质材料作“硬笔”刻画文字图画外,已经开始用动物的柔软的毛、羽作为书写工具的笔头。这种笔我们可以称它为“毛笔”。当然,绝不是今天这种形式的毛笔,只能是较为原始简陋的制作,但它毕竟是后来毛笔产生、完善的基础。大汶口文化稍晚于仰韶文化,距今也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从实际上证明了当时毛笔的使用。

稍晚于西安半坡村遗址的甘肃仰韶文化马厂类型的陶器符号(只见于一种彩陶壶)用笔流畅,彩陶图案精确匀称,线条柔美,多带有弧形。并且在点画的起止上,有较明显的毛笔痕迹。据此分析,纯为毛笔一类工具绘写。

近代俞国华在《中国绘画史》书中认为:“毛笔和墨都创始于

新石器时代,根据那时的彩陶图案,确有笔锋,还有笔毫描画的痕迹,并可分辨大小不同的毛笔。”马承源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书中,也肯定了毛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被人们用来绘画图案。因此,我国使用毛笔的历史,应始于新石器时代。淮南子《本经训》中有其记载:“仓颉<sup>①</sup>作书,鬼(鬼即兔)夜哭。”是说当时人们作书时,所用笔的原料均以兔毛为主,兔子唯恐取自己身体上的毛制笔,害及身躯,危及生命,故日夜啼哭不止。这虽是神话,但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杀兔取毫造笔的普遍性,同时也佐证了新石器时代有制造毛笔、使用毛笔的历史。

到了殷商时期,我国开始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后期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较完备的文字。因刻在龟甲兽骨上面,又留有墨的痕迹,故有用刀笔信手刻字和先用毛笔写好底子,然后用刀照着契刻而成的两种说法。不论哪种说法,毛笔用于甲骨文的书写或填色当是毫无疑义的。

殷商的毛笔,只能在史料和实物留有的痕迹上推测证实,在考古发掘中至今尚未见到当时的毛笔实物。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中说:“所谓毛笔,不必如现世所用的竹管兔毫,只要是一支小兽的尾巴,或者一丛捆在一起的细毛。”这种推测,是否符合当时历史实际,无须多加评论。可以想象,最初的毛笔只能是较为简陋的,绝不会像今天的毛笔这样完美,也绝不会有软毫、硬毫和兼毫的区分。

---

<sup>①</sup> 黄帝时人,为左史,人称“史皇”,传汉字为其所创。

## 二、毛笔最早的记录与实物

商殷时代的毛笔，至今仍没有实物可见和著录记载，而多是考古工作者对一些出土文物进行研究，间接地推测出毛笔的存在和应用。只能言传意会，很难直观地确定当时毛笔的形制和其他的历史。但到西周时，毛笔的记载则多见于一些古籍中的字里行间。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静女》篇中有“贻我彤管，彤管有炜”的诗句，这里的彤管，就是指红色管的毛笔。晋时傅玄《笔铭》中同样有彤管的记录：“铍铍彤管，冉冉轻翰，正色元墨，铭心写言。”这些记载说明了我国从周始，人们以彤管相赠，意蕴亲近或作爱情的相赠物。《后汉书》中载：“女史彤管，记功书过。”以此来看，彤管即毛笔是无疑义的。它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彤管在古时为宫中女官执掌，专门记载宫中政令、后妃功过等事宜所用。

周初时《太公笔铭》中说：“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可活。”这说明“毫毛茂茂”的毛笔，必须渍水才能书写。如这记载就是当时真实记录的话，足以断定，周时就已有使用毛笔的历史，并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孔子在《春秋》书中就有“绝笔于获麟”，“笔则笔，削则削”的话，削则是古代加工简牍和改刮错字的重要文书工具。这说明在春秋时，毛笔已广泛运用于书写之中。孔子在《尚书》中的《侯言》篇中说“周公授笔以写之”，西汉书家刘向《说苑》中也有“周公笔牍书之”之说。这些记载说明了周时确已有笔和实用笔的历史。

以上这些记载的可靠程度如何呢？根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和出土文物的不断发现，毛笔实物以它本来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为上述记载的可信性作了最好的注脚，更证明了毛笔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书写工具。1954年6月，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中，出土了一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作的较为完整的毛笔（如图2），笔头和整个笔身都套进一支竹管里。实心的竹笔杆，用工具削成圆柱形，笔杆长18.5厘米，杆粗0.4厘米，笔毛长2.5厘米。笔毛围在笔杆的一端，用细长的丝线缠紧，外面再涂上一层漆，使其固定牢靠，此笔笔尖具有锐键的特点，弹性强，蓄墨较少，不易多写。因发掘地在长沙，当时属楚国，故这支笔便被命名为楚笔。这支笔目前为我国最早的毛笔实物，但绝不是毛笔的启端，其源头仍可向前追溯，但它为我国的毛笔发明史提供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在发现毛笔的同时，还出土了铜削、竹片、小竹筒三件，这便是当时写字的一整套文具。竹片是供写字的简，铜削是用以刮削修正竹片上的错字的，小竹筒是盛放这些文具的。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相当注意书写工具的保养。以后，在湖北江陵、河南信阳等地楚墓中，都有战国时期的毛笔出土。这些文具和毛笔的出现，说明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就用毛笔在竹木简上写字，也使我们有幸见到两千年以前的毛笔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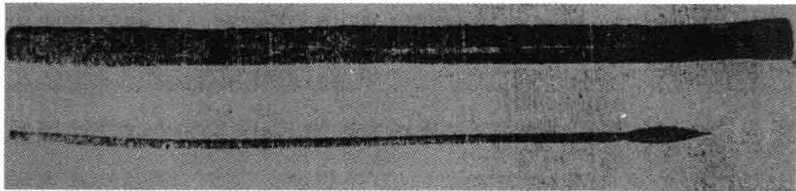


图2 战国毛笔



当时,由于各诸侯国割据称雄,各国文字各不相同,对书写工具的称呼也不尽统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到了秦代才称为笔,故有“蒙恬造笔”的传说流传至今。蒙恬是秦时有名的大将,曾统率三十万大军,击退匈奴的进攻,收复河套一带地方,后又奉秦始皇之命,负责监造长城。一次,蒙恬偶然看到城墙上沾有一些羊毛,便随手扯下,绑在一根木棍上,当作笔来写字,粗细大小,甚感方便,这便造出了我国第一支羊毛笔。这一传说后来便流行开来。浙江吴兴善琚镇还修建了蒙恬祠,以示纪念。蒙恬被后人尊为笔工之祖师,作为笔神,备受顶礼膜拜。《千字文》中就有“恬笔伦纸”的语句。传说毕竟是传说,当今大量文物的出土研究证明,早在秦以前,就已有毛笔的存在和运用。晋代崔豹《古今注》中说:“昔蒙恬始作秦笔耳。古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秦蒙恬始以兔毫、竹管为笔。”崔豹这一说法,应当说是较客观的。

考古发掘与研究证明,秦笔和崔豹《古今注》中记载的相吻合。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一座秦墓里出土的器物中,发现了三支毛笔、一块烟墨、竹木简牍一千一百余枚、石砚一方、铜削刀一把。其毛笔为竹质,笔杆上端削尖,下端略粗,镂空成毛腔。笔杆长21厘米,径宽0.4厘米,笔毛长约2.5厘米,笔头形状,至今仍团聚圆饱。出土时,三支笔都放在用细竹管制作的笔套里。笔套中间两侧各凿一孔,以便取笔。其中一笔套的两端,有一骨圈紧缚,笔套上面并缠丝上漆加固。因笔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又在秦墓之中发现,故被称为云梦秦笔。秦笔经历了两千一百多年之后,终于再见于人世间,它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悠久的历史。